

1

新的世界秩序， 二次大战后的格局

保罗·沃尔克

概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所发生的经济规划和国际机构的建立，不论在其范围还是视野方面，都是没有前例的。在战争中——那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以及在一段艰难的和平时期的过渡中，各国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些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和关贸总协定（GATT）的特性达成了协议。总起来讲，这些协议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打下了思想和制度的基础。这种秩序将体现为致力于稳定汇率，发展平等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没有哪个国家得到特别优惠），迅速重建被破坏的经济以及达到使穷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根本上讲，它的理论基

础是以市场为出发点的自由经济体系思想，这也正是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主要共产主义国家宣布放弃的原因。

这种看法得到了美国这一大国政策的支持。美国当时既有能力也有获得领袖地位的兴趣。凭借其完好无损的工业、高水平运行的经济以及无可争议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在战后崛起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同，绝大部分战争债务很快被免除了。1946 年庞大的盎格鲁——美利坚贷款——相当于今天的 250 亿美元——帮助美国战时的主要盟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稳定。几年之后，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促进了在欧洲复兴方面的有效合作，并提供了用以履行这些计划的所缺资金，在一段时间内它达到美国国民总产值的 2%。

如此大规模的智力劳动、国际机构的建立，以及为了国际经济合作利益而发生的资金和资源的转移，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它是由于一连串特殊情况而发生的。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代人的和平进程，由于需要赔款以及难于管理的债务，弄得一塌糊涂，使国家之间政治上对立，经济也不稳定。30 年代出现的大萧条，似乎对资本主义能否生存下去提出了挑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伴随着保护主义、经济不稳定、贸易急剧缩减的浪潮。在接踵而来的第二次大战的破坏下，各国政府开始接受新观点，而且，实际上它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蓝图。1945 年有一个国家的产出约占世界当年总产量的 40%，它的政府具备足够的力量和远见为推行那些新观点提供推动力，这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由于谈判只有两个实际参加者，也是两个获胜的盟国：美国 and 英国，于是谈判过程得以大大简化。而且它们对谁的地位更高也没有争议。但即便如此，在欧洲牢固地为战后的复兴打下基础，以使新的贸易和金融安排按设想的进行还是花费了十年多的时间。但发展、合作以及信心增强的感觉很快变得明显可见，而且这种感

觉也很快笼罩了德国和日本这些战败国。

如何开始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本书作者投身于国际金融事务中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是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事情（其中部分是在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其管理方式为美国和日本财政官员的首要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而且我们也开始接受它的运作方式，就象是在一个运转正常的世界经济秩序下很自然的事情。在 1962 年初 我来到华盛顿就职于财政部，从此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事务。但显然 就象华盛顿档案馆大楼的铭文所写的：“过去即序言”我首先要把自己置于 50 年代那已消失的氛围中。

我起初担任较低级别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政府债券交易员。我在那儿学到了很多有关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东西，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也学到了很多有关官僚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知识。当然，那时候的联邦储备银行是很官僚的机构。我所写的一些东西我不指望读到，因为我不在限制性传阅的名单上。当你为了回答行长的问题而写下一个备忘录后，它首先被交到你的上级那儿，他会在上面写些批注，然后交给他的上司，再以后它被交给副行长，就这样直到最上层。如果行长有什么批示的话，它也会按照同样曲折的途径反馈回来。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阿伦·斯普劳尔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所以不管官僚政治是如何的僵硬，它似乎还是有价值的。我想可能所有大型机构都是这样运作的。

此后我来到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其经济学家职员的实力要薄弱得多，因而我似乎在与“金融”有关的一切事情上都多少象个专家了。说来惭愧，我至今仍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那是在联邦储备银行所未曾经历过的。1958 年初，我被召往行长乔治·钱皮恩

的办公室。在处理完一些日常问题后，他说：“再坐一会儿。我在担忧我们的贸易地位。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力好像下降了，这也将影响美元。你是怎么想的呢？”喏，国际贸易和金融还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因而我试图用当时经济学家们的标准答案来回答：“不必担心。我们用于增加进口的美元越多，其它国家拿它来增加从美国进口商品的数量也越多。美国没有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问题。”

那段时期是“美元短缺”理论的全盛时期。我还记得 50 年代初在哈佛有一门研究生课程，我的著名教授在授课中提出了这一基本论点。这个论点就是，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并且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多少将长期保持技术和生产效率方面的领袖地位。其结果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势必大大超过其他国家，这样将有助于使我们保持强大的贸易地位。其他人认为其必然结果是我们将有能力在国外投入非常多的资金，这样做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回顾大萧条岁月，他们认为繁荣的美国不可避免地无法找到将全部储备投在国内的地方。其结果是，我们将提供有益的高水平官方援助，并最终导致私人向国外投资，以使其它国家买得起我们的出口商品，并使我们的工人不至于失业。否则的话，由于经济学家们起初所谓的“美元短缺”理论，我们将无法卖掉我们所能生产的东西。今天一项对《经济论文索引》的小型调查，发现了有关这个题目的一整摞文章。《索引》中，1940 年至 1949 年有 10 篇论文，1950 年至 1954 年有 33 篇。1957 年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名叫《美元问题》。

我记得我对所有这些理论都有过怀疑，而当我回答乔治·钱皮恩问题时，如果我表白了那些怀疑就好了。在他提出问题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变得不利，到年底我们损失了储备中价值 23 亿美元的黄金。一些微弱的信号，表明对美元的信心并非坚不可摧。这些对于我都是很好的教训：如果你不能理解教授正在

说些什么，你就不该排除这些话有不正确的可能。在市场中实践的人们，有时能够比那些沉浸于过去数字的经济学家们更快地感觉到市场趋势的变化。事实上，《经济论文索引》在 60 年代只收录了一篇有关美元短缺问题的文章；我猜想那肯定是一篇追溯性的文章，解释以前那些文章都错在了哪里。

现在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常常被指责为没有对想当然的国内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国际后果予以足够的重视，但那时更是这样。进口、出口和国际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枝节问题。实际上一般的经济课程中所传授的有关经济管理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国内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对经济政策的考虑，都被大萧条的记忆以及如何达到并保持国内充分就业问题所主宰了。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国内政策重点在政府支出及税收上，这也被称之为财政政策。但也有一个关于国际货币安排的教训。金融的不稳定，不仅仅是指国内恐慌和银行倒闭，也指国际间金融的不稳定，它被认为是在战争和大萧条的深渊之间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人们有这么一种感觉，即每一个国家都不惜以汇率大幅度波动和高额关税为代价，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政策，以图解决国内问题。

1929 年至 1932 年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这段时间世界贸易下降了 60%，这是个大幅度的下降，人们显然把它与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联系到了一起。这种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基础上的，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特点对于货币界就如同牛顿定律对于物理学界一样，意味着体系的井然有序。

相比之下，30 年代所盛行的浮动汇率，被与货币混乱以及贸易受挫联系在一起。最糟糕的是，规则的缺乏提供了一种通过操纵汇率来取得不公平贸易优势的诱惑，这被称为“以邻为壑”政策。一般的想法是尽量使你自己的货币贬值，从而使你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便宜，并借以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如果一切按计

划进行 其结果将是这样的 增加本国产量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摆脱 30 年代大萧条所带来的僵局。有些国家在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似乎比较成功,但结果是损害了其它国家利益,因为它们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于是产量下降了。而当它们开始采取报复行动之后,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伤害。对于那些建立战后世界(格局)的国家而言,他们非常担心所谓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会继续下去,这会以牺牲其邻国利益为代价来支持一个国家的出口增长。

我认为,修正主义学者们怀疑战争前的竞争性贬值是否真的像当时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经济学家和其它学者喜欢重新审视一下每一时代的历史,也许是该重写竞争性贬值历史的时候了。但我本人并不怎么怀疑 30 年代的两次大幅度贬值——1931 年在英国及 1933 年在美国的贬值——的确给它们的贸易伙伴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引发了新一轮的不稳定过程。

在用到曾经很普通的词“以邻为壑”时,我才意识到有一二十年在政策讨论中没听到过这个词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人们更加担心一种货币的贬值会由于提高进口价格而导致通货膨胀。大萧条时期没人担忧过这点,当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价格的不断下降。实际上 美国在 1933 年贬值的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商品价格 特别是农产品价格 以扭转 20 年代开始的农业萧条局面。这个目的是通过逐步提高在市场上购入黄金的价格来达到的 当黄金价格从每盎司 20.67 美元上升到每盎司 35 美元后 这一过程才停止了。最终益处是什么,以及罗斯福总统为什么在每盎司黄金达到 35 美元时停止这个过程,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不管它是否是专横武断的 每盎司 35 美元的黄金价格作为战后体系的一个锚被人们接受了,这个价格持续了将近 40 年 并且 在这些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黄金价值 35 美元一盎司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

美国人说它值这么多，而且是因为美国愿意从任何想出售黄金的人那里购买黄金，以支持这种政策。只是当 60 年代的买、卖平衡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并且美国在一段延续的时期内丧失了黄金后，这种战后货币体系才开始松散起来。

缔造新货币体系的最后谈判，于 1944 年夏在战争结束之前举行，地点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白山的大世纪之交度假酒店。（如果你现在访问那里，你将在酒店中发现纪念该会议的匾被安置在醒目的地方，这是花巨资安装的，比以它命名的体系更加经久不衰。）在战争中举行讨论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当时的国际市场实际上停止了运作。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完全重建世界货币体系的协议的具体细节能在任何其它时候达成，除非当时根本就没有一个体系在运作，而沉重的战争负担有效地阻止了那些更狭隘的考虑。

关于目标人们没什么疑问，计划者们想避免货币动荡，大萧条曾经以货币动荡为特征，而且正是这种动荡引起了大萧条的爆发。基于这点，他们希望有一种处于国际监督和指导下的固定汇率体系。他们想结束对国际贸易和服务的管制。只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支持汇率变化，这种情况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的不平衡”。而且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成立了一个有着自己雇员的国际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新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以便为战后重建世界提供资金。

当然，围绕着如何履行这些想法，出现了许多讨论，一些争论持续反复出现。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是那个时代的首席经济学家——代表英国提出自以为是的计划，其目标在于经济扩张。该计划期望创造一种与国家储备中黄金所不同的复合国际货币；他还提出了这种货币的名字，班柯（bancor），这个词是“bank”（银行）与法语词“黄金”的合成物。凯恩斯希望国家储备的供应量大一些并具有潜在能力，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国内推动和执行充分就业政策，而不致于为了支付可能出现的贸易赤字而很快耗尽资

金。几年前 他还称黄金为“一种野蛮的遗迹”并且不希望整个世界，尤其是英国受一种仅依靠有限数量的黄金来支付国际收支赤字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束缚。

从美国人的观点回顾所有这些事情，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凯恩斯对一个高产、繁荣的美国将处于长期收支盈余状态，吸收各国储备的担心——换言之，也就是人们所畏惧的美元短缺。他觉得在该体系中必须有一些限制长期盈余国的措施：鼓励它们扩张，使进口自由化，在海外进行投资，或向其它国家提供援助以免它们的储备流失殆尽。在金本位制下，或是在任何一种采用固定汇率的货币体系中，陷入赤字的国家多多少少会自动受到惩戒。它们竞争能力的缺乏，低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使得它们的储备流向那些有着较高利率以及实行更稳定或低速增长政策的国家。并且，当它们失去了足够的储备时，它们不得不做出反应；典型的办法是提高它们的利率，这会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从世界的观点，更具体地说从英国的观点来看，凯恩斯担心出现太多对抑制经济的偏见。

他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就是他那种实现较多储备供应量的观点。第二，他想建立一种自动体制，以惩罚那些通过长期、大额贸易顺差而积累了过多储备的国家。当它最终被接受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允许那些极度出超国家即据信为拥有“短缺货币”国家的贸易伙伴，可以通过限制购买它们的出口产品来惩罚它们，这是一种潜在的严厉惩罚措施。但是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反对一切将该条款付诸实行的建议，该条款成了一纸空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凯恩斯在 1944 年的担忧，30 年后当德国和日本获取了巨额顺差时也成为美国的担忧，但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决。

由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所倡导的计划与凯恩斯的计划有许多共同特点，其中明显的一点都是有一

个在国际机构监督下的固定汇率体系。然而它的范围要小一些。怀特的想法是逆差国家不应以自动牺牲世界主要顺差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得到过多很方便的融资，当然当时主要顺差国就是美国。30 年之后，当美国陷入赤字时，在欧洲也出现了与怀特相同的看法。凯恩斯提出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价值 350 亿美元的国际储备，而怀特只提出 5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通过现存储备获得。最终协议规定的 88 亿美元周转性借贷资金更接近于美国的提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美、英两国间势力的对比。

事实上，为了启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不得不投入比怀特或财政部预计要多得多的资金。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在 1946 年由美国和加拿大向英国提供 37.5 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重建其储备，并使英镑得以在国际上使用。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但人们对英镑的信心太低了，以至于这些资金未能维持多久。而旨在推动重建整个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却要成功得多。它承诺持续两至三年的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2% 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每年 1000 亿美元。但只是当欧洲人在我们的监督下共同有效地推动该计划发展时，我们才付清了这些钱。他们以一种将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式，重建了基础工业和交通结构。这个计划在实施中体现了高度的技巧和效率。即便如此，当欧洲，还有后来的日本，在恢复了它们的经济后，对进口和对外放款的管制也只是逐步放松的。多年来，美国忍受了对其出口的歧视，而且那些国际借款人都是出于实际目的才不得不来到我们的市场。

尽管不论是在预算上还是什么别的方面，美国的直接花费很大，但对权衡利弊后的优势从来没有过太多疑问，不论这种优势是以世界秩序还是以美国自身利益来衡量。人们对萧条和战争都还记忆犹新，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繁荣根本不会使人对这种花费产生担忧。相反，一些精英们（这在那时还不是一个太坏的字眼儿）有种强烈的使命感以及领袖欲，工人和商界均对美国经济竞争

力充满信心，对开放的市场和海外的强大经济投下了赌注。

游戏规则

关于国际经济顺利运作的新规则，被大胆地写入一些相对较短的创建性文件中。它们要求货币事务上进行合作，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体系以及在加快经济发展方面进行协作，而在当时这些目标都不是想当然就可以达到的。在共产党掌权后，中国选择置身局外，这绝非巧合，而且苏联也从未加入这些组织，自然它也不会允许它的卫星国们保留成员国身份了。只是在中国人开始经济改革后，它们才回来。东欧国家也只是在苏联的统治宽松后才能够申请成为成员国资格。现在，那些前苏联的共产党国家把申请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作一项优先考虑的事情。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有一点儿复杂。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为其货币制定“平价”，即以黄金或另一种能够转换为黄金的货币来确定该国货币的汇价。实际上，对于除了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而言，那种货币就是美元。就这样，它在这种体系的核心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中没有具体谈到美元。

完全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必须随时准备应其它持有本国货币的国家货币当局的要求，来用本国货币兑换黄金或其它一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这种兑换应以他们所宣布的平价进行，只能增或减不超过 1% 的幅度。其实际作用是以较小的变化范围来确保一国货币在市场中处于一种固定关系。在经过最初一段时期后，这些固定的货币汇率，只能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同意后才能贬值或是重新定价。

作为世界上主要经济和金融大国，美国是唯一准备应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请求将自己的货币兑换成黄金的国家——也就是

说，保持黄金的可兑换性^①。它还是在新体系启动后唯一可以这么做的国家。1945年底，在所有国家官方储备的 9.65 亿盎司黄金中，美国拥有 5.74 亿盎司，也就是说，按照 35 美元一盎司的价格，总价值为 201 亿美元。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其它国家很愿意在其有限的储备中大量保留美元，储存美元能够有利息，而储存不生息的黄金则无丝毫增值。这增加了该体系的灵活性。

这个新体系还有一些其它特征，即可以消除传统金本位的缺点和过度僵硬。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从它 88 亿美元基金中向成员国提供贷款。这被称之为“提款权”，它的数量由一个公式推导出来，该公式反映了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地位。按照设计，贷款的数目越多，得到它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是该体系的一个重要规定。面对一些想要获得大量贷款的国家，基金的职员们最后发展了一种被称作“条件性”的尺度。即用来监督一国在削减贸易和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表现的一系列复杂监督程序，只有达到了这些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发放连续贷款。

汇率变化的本身并没有违反这些规则，但采取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当其它致力于恢复贸易及对外收支平衡的努力都不足以达到目的，或是产生了相反作用时的最后一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者显然认识到，成员国需要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办法，如果他们的政策被证明为与他们的汇率基本不协调，进行一次贬值被认为比让国内长期处于失业状况更为可取。那些对贸易、旅游业、外国援助以及其它经常项目支出实施管制的国家也受到劝阻。人们对在困难时期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态度更为宽容；其中部分原

除了工业用途外，甚至美国也不愿接受把黄金卖给私人，包括其公民的承诺。在大萧条中期，要求美国公民将其黄金交给财政部，以支持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并严禁投机。这项政策一直保持到 70 年代。

因是由于认识到巨额投机性资金转移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破坏货币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

绝大多数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键的操作性问题，都被留待以后的判断和实践。坦白地说，创建者们的意图，是在储备的建立、融资以及汇率的变化等方面提供更多的灵活性，而这在金本位制下受到严格限制而不太可能。但从一开始，各国与个人的重点就有所不同。原则性的问题，如应该在经济政策和执行上做出多少“调整”以结束不平衡以及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需要多少“融资”，如同佛罗伦蒂那的银行家所作出借钱给欧洲王子们的判断一样古老，也象有关向新的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各后继国提供财政帮助的争论一样现实。这是一个将在整篇文章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从 60、70 年代出现的改革努力到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

至少，在汇率中应有多大的灵活性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有一定困难。显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者在当一个国家被判定为贬值时——用国际货币基金的话，它处于“根本性不平衡”之中——无法提出任何严格、确切的准则。在长期投身欧洲中央银行业之后，于 60 年代初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皮尔·雅各布森说，给均衡下定义就如同给一个漂亮的女孩儿下定义一样难，“只有你见到一个，才能认出一个”（他的话是在女权运动之前说的）。

那么，就如同个人对女人的品味不同一样，一个男人的观点，即使应予尊重，但无法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个二十五年之内，由重要国家做出的贬值行动并不经常发生。在战后调整阶段初期，欧洲经过一轮大规模重新定价后，在重要贸易国家中只有英国在 1967 年，以及法国在 1957 年 1958 年的两步调整以及 1969 年进行了货币贬值。加拿大采取两次浮动措施，尽管这不符合规则。同样例外的是德国在 1961 年和 1969 年两次使马克升值。而日元对美元的比率，1949 年在

美国关于具备适当竞争力的建议下被定为 1:360。这个比率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都未改变。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由于违反国际协议的规定，那种出现无关联汇率变化的可能性对于市场而言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不安，而对于政府而言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对于这个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而言，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建立时，这样的变化是难以置信的。

在 1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为达到稳定和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规定远不如美国所提供的资金来源、开放的市场和贯穿始终的安全保证奏效。美元得到广泛接受和使用，是对这些现实的自然反映；这被战后计划者们以及世界市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一项人为构建的国际协议。

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美元的特殊角色意味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运行不相容的特权和负担。具体地说，美元作为一种储备货币意味着即使美国没有放弃自己的黄金储备，也没有借入其它国家的货币，但只要其它国家还想增加它们已有的美元储备，美国（不像其它国家）仍能在国际收支处于赤字的情况下继续运作。事实上，增长了的外国美元储备为美国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国际收支赤字提供了低利率的融资，而且对美国而言没有汇率上的风险。同时，这些持有的美元为其它国家对新的储备和流动性的需要提供了一个重要来源。

只要人们还愿意持有美元，所有这些似乎都有足够理由而存在。只要美元还被认为不仅和黄金一样好，甚至比黄金更好，那么愿意持有美元就是对的。但是，对这种看法当然也有争议。如果黄金和美元的基本平衡——或者更广泛地说，美国愿意维持它自己的价格和经济稳定及其市场开放——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使这个体系稳定的基石就被动摇了。这实际上就是 60 年代开始发生的事情，但在 50 年代绝大多数时间内，美国一直在增加黄金（储备），美国经济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仍是一支独秀，其价格相对来

说也比较稳定。而战后经济体系和共同防御的盾牌后面，支离破碎的欧洲和日本经历了一段非同凡响的复兴过程。

行天丰雄

我和保罗·沃尔克结识于 20 年之前。那时，他已经是端坐谈判桌前的一个重要人物了，而我自己则还是个给上司拿皮包的低级官员，坐在后排，心神不安地注视着我的上司在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因而你可以看到在我和他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更不用说我们在外形上的差别了。不过，我可以骄傲地说，毕竟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信任。

当 1944 年国际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创建的时候，日本还在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所有主要城市都被彻底炸毁了，而当 1945 年战争终于结束时，日本在过去的 10 年中丧失了其 1/4 的国民财富。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国民总产值是 10 年前的 60%。而工业产值仅为 30 年代中期的 30%。

战争结束后的第十年 我于 1955 年进入日本大藏省。我至今还记得按当时汇率计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 20 美元。日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 200 美元 约为当时美国的 1/10。1956 年我来到普林斯顿，在由美国国务院提供资助的富布赖特奖金下做研究生工作。我用三周时间乘船横跨太平洋，第一次访问美国的登陆地点是西雅图。

在我离国之前，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就如何以最低价吃一顿饱饭给我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向我保证吃一份火腿生菜三明治加一杯巧克力饮料就可以果腹。牢牢地记住了这点后，我紧张地登上了柜台前的台子吃了第一顿午餐。服务员是位黑人妇女。我要火腿生菜三明治，尽管正确地发出‘L’的音 因为这个读音在日语中不存在。那个服务小姐只瞟了我一眼，就用很商业化的方

式问道：“黑的还是白的？”

我立刻觉得我要的东西她恐怕没弄清，因为对我来说，她的问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于是我重复了一遍“火腿生菜三明治”，尽最大努力以说得缓慢而清晰。这回她看着我，坚决地重复道：“黑的还是白的？”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在我离开日本之前，有人向我简单地介绍过美国的种族隔离，其中谈到在一些为白人准备的场所不允许黑人在场。啊，她一定是在问我的种族了！我有些慌乱，感觉自己正在接受对良心的考验。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觉得自己必须诚实。于是，我有些骄傲地答道：“黄色的。”那位服务小姐完全被激怒了。她一手举着一片白面包，一手举着一片黑麦面包，对我吼道：“黑的还是白的？”

任何层次上不同文化间沟通的困难，是国际生活中从来不应忽视的一个事实。离开普林斯顿后，我回到日本就职大藏省，一直到 1990 年。在那里我从日本这个窗口注视着国际货币关系的变迁，并参与了日本不断加强的介入。当然，在大藏省的 35 年中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当我回顾那些日子时，它们就好像是一个撑竿跳运动员的一连串慢镜头。一个横杠被放得很高，你认为他不能越过去。而当他开始跳时，他所撑的竿弯得很危险，你觉得它肯定要断。但是，随着镜头的推移，你看到运动员成功地越过了横杠这是我们历史的闪光的一面。

同时我不得不承认，绝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处理那些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都带有一些很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显的被动，表现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台上扮演角色。它只想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不愿和其他人掺和在一起。而且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排他的投入态度。我认为这两个特征的结果，是战争、战败的经历以及受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时的经历的影响。

随着日本国外资产的增加，以及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

商业份额的大幅度扩大，促使日本抛开了我们承受多年的符咒。最后 在 80 年代，我们开始为成为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进行有意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很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

2

在布雷顿森林的 灌木丛中 :60 年代

保罗·沃尔克

概述

回顾一下 在布雷顿森林之后的第一个二十五年中 世界经济的表现是十分卓越的。美国本身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3% 这在其历史上是罕见的，其间只发生了短时间轻微的衰退。实际上，60 年代结束时，这个国家已经创纪录地保持了连续九年的增长，而一些浮夸的经济学家已经准备提前宣告战胜了商业周期。在起点要低得多的欧洲，增长幅度甚至更大。战争后复兴以及其后的扩张是以联邦德国为首的，它成了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然而德国人创造的奇迹又被日本所超过了。到了 60 年代末 日本凭借 10 年中约 12% 的复合增长率的实力，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